

# 瘟疫下的社会拯救

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

著

余新忠

赵献海

张笑川

惠清楼

乌云格日勒

赵琦

中国书店

# 瘟疫下的社会拯救

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

著

余新忠

赵献海

张笑川

惠清楼

乌云格日勒

赵琦

中国书店

责任编辑: 润 农

封面设计: 晓 程

## 瘟疫下的社会拯救

——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

余新忠等 著

---

出版: 中国书店

地址: 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

邮编: 100050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北京市李史山胶印厂印刷

开本: 880 × 1230 1/32

版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96 千字

印张: 13.125

印数: 0001—3000

书号: ISBN 7 - 80663 - 193 - 3/K·157

定价: 26.00 元

---

敬告读者

本版书凡印装质量不合格者由本社调换,  
当地新华书店售缺者可由本社邮购。

# 瘟疫下的社会拯救

——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

余新忠 赵献海 张笑川  
惠清楼 乌云格日勒 赵琦 著

绪论	余新忠
第一章	赵献海
第二章	赵献海
第三章	惠清楼、余新忠
第四章	惠清楼
第五章	余新忠、惠清楼
第六章	张笑川、余新忠
第七章	乌云格日勒
第八章	赵琦、乌云格日勒
第九章	张笑川
第十章	余新忠
第十一章	余新忠、张笑川
结语	余新忠

## 目 录

绪 论	( 1 )
<b>第一章 中国近世疫情概况</b>	( 13 )
第一节 关于疫情图表	( 14 )
第二节 疫情的时空分布	( 19 )
第三节 瘟疫的种类	( 27 )
第四节 疫情特点	( 39 )
小 结	( 46 )
<b>第二章 明末大疫与明王朝的死亡</b>	( 49 )
第一节 明末政局	( 51 )
第二节 疫情流行概况	( 58 )
第三节 瘟疫的种类	( 73 )
第四节 瘟疫发生和蔓延的原因	( 82 )
第五节 瘟疫的后果	( 86 )
第六节 官府与社会的瘟疫救治	( 91 )
小 结	( 99 )
<b>第三章 大灾与大疫</b>	
——乾隆二十一年(1756)的江南大疫	( 103 )
第一节 背 景	( 105 )
第二节 疫 情	( 110 )
第三节 影响与应对	( 114 )
第四节 大灾与大疫	( 119 )

小 结	(122)
<b>第四章 近世中国的新瘟疫</b>	
——以烂喉痧(猩红热)和白喉为中心	(125)
第一节 近世以来中国的新瘟疫	(126)
第二节 关于烂喉痧和白喉	(127)
第三节 烂喉痧和白喉出现年代考略	(129)
第四节 社会生态变动与新瘟疫	(148)
小 结	(152)
<b>第五章 丰年行大疫</b>	
——嘉道之际真霍乱的大流行及其影响	(153)
第一节 背 景	(153)
第二节 嘉道之前中国之霍乱	(156)
第三节 疫 情	(161)
第四节 嘉道之后霍乱在中国的肆虐	(170)
第五节 当时及此后社会各界对霍乱的应对	(174)
第六节 霍乱对医药卫生事业的触动	(178)
小 结	(186)
<b>第六章 战争与瘟疫</b>	(189)
第一节 太平天国战争与苏浙皖大疫	(189)
第二节 19世纪中期回民起义与云南鼠疫	(216)
小 结	(235)
<b>第七章 中西冲突与细菌学说的进一步确立</b>	
——1894年的香港鼠疫	(239)
第一节 鼠疫之背景	(241)
第二节 流行概况	(245)
第三节 中西冲突	(247)
第四节 社会应对与鼠疫杆菌的发现	(253)
小 结	(257)

<b>第八章 国际化的现代防疫机制的初步形成</b>	
——清末东北鼠疫·····	(261)
第一节 国际贸易与东北鼠疫缘起·····	(262)
第二节 鼠疫的出现与流行·····	(264)
第三节 中外之应对·····	(267)
第四节 万国鼠疫大会的召开和现代防疫机构的初步建立·····	(273)
小 结·····	(277)
<b>第九章 1932年全国性霍乱流行</b>	
——国家卫生防疫机制的确立·····	(279)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社会状况及疫情简况·····	(279)
第二节 1932年的霍乱疫情·····	(283)
第三节 政府和社会的应对措施·····	(289)
第四节 1932年霍乱疫情的成因及影响·····	(297)
小 结·····	(305)
<b>第十章 近世瘟疫成因综论</b> ·····	(307)
第一节 灾荒(包括战乱)因素·····	(308)
第二节 人口因素·····	(312)
第三节 环境因素·····	(317)
第四节 习俗因素·····	(327)
第五节 社会经济变动因素·····	(337)
小 结·····	(339)
<b>第十一章 国家和社会疫病反应机制综论</b> ·····	(343)
第一节 国 家·····	(344)
第二节 社会力量·····	(362)
小 结·····	(390)
<b>结语:回顾与省思</b> ·····	(395)
一、近世疫情的概况与特点·····	(396)

二、近世瘟疫的成因 .....	(397)
三、近世瘟疫的影响与后果 .....	(399)
四、近世瘟疫的影响与后果 .....	(402)



## 绪 论

说起中国的瘟疫史,恐怕就是具有相当历史修养的知识人,也会感到茫然。在传统的史学视野中,瘟疫这样似乎无关历史发展规律宏旨且本身又不具规律性的内容,不过为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至多也只是历史上一段段尚值得回味的插曲而已。故而长期以来,阅读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几乎让人不知“瘟疫”为何物。

如今,生活在科技飞速发展时代、享受着现代医学种种嘉惠的人们,对那种危害重大的瘟疫的记忆自然更是渐行渐远。然而令人始料不及的是,2003年年初,一种全新的疫病 SARS 突然降临于神州大地,并几乎迅速传遍全国并远流海外。面对这一不期而至的现代瘟疫,社会一时流言四起、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令人不得不感喟,原来,那种能够危及全民的瘟疫并非只存在于尘封的历史中,而是随时都有可能进入我们的现实生活。

现在,这场令人心悸的灾难已经过去,随着人们日常生活

渐渐恢复正常,那些曾经由 SARS 带来的生活限制、紧张、焦虑以及混乱也自然会慢慢地淡出芸芸众生的记忆。但无论如何,在思想文化界,知识人显然不可能轻易地让这场铭心的灾难如此迅速地消散于无形的空气中,从而使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失去一次“亡羊补牢”的机会。毫无疑问,非典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医疗卫生问题,由这场现代瘟疫所引发的种种社会、政治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无论哪一方面都值得我们整个社会很好地省思。“亡羊补牢,未为晚矣”乃是中华民族早已烂熟于心的道理,事实上,所谓“后 SARS 时代”的种种反思目前已在学界广泛地开展起来。这些反思是多层面的,既有对现实社会机制的批判和建构,也有对当今社会发展总体理念以及中国文化建设的重新思考,还有有关当下学术发展思路的反省,等等。这些从不同视角出发的反思无疑都自有其价值,不过,无论如何,这些省思不可能仅仅立足于 SARS 这一单一事件而展开,而必然需要了解甚至深入认识人类以往的相关经验,否则,反思也就不可能具有足够的深度和强度。由此可见,对人类瘟疫历史的回顾与认知具有毋庸置疑的现实意义,实际上,面对非典,我们的社会和民众所表现出的惊慌失措、应对失宜,也多少与今人对瘟疫史的失忆不无关系。

显而易见,瘟疫绝不仅仅是自然生理现象,而是关涉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社会文化问题。故而,对历史研究者来说,实际上,其欲探讨的,确切地讲,也就不应称之为瘟疫史,而应是瘟疫或疫病社会史。即:该研究并不只是关注疫病本身,而是希望从疫病入手,呈现历史上人类的生存境况与社会变迁的轨迹。当然,开展这一研究,并非只是出于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或许更为重要的还是源于其独特的学术价值。人之一生,与自身最密切相关的莫过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这些似乎无关社会发展规律之类宏旨的细微小事,其实正是人类历史最

真实、最具体的内容。现代国际学术发展趋向,已经逐渐摆脱对结构、规律和因果关系等的过度追求,而表现出对人本身的关注以及对呈现人类经验的重视。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工作者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社会发展规律等问题的探讨之中,而对历史上人的生存状况、生活态度和精神信仰等等与人本身直接相关的问题则往往视而不见,瘟疫这一虽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但显然并不直接关乎历史发展规律且本身又不具规律性的内容,自然就更不在历史学家的视野之中了。在中国史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虽然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衣食住行已越来越多地受到研究者的注目,但直接关乎生老病死的疾病医疗,仍基本还是历史学的“漏网之鱼”。实际上,只要稍作考量,便不难发现,疫病与医疗无论对历史还是当今社会都有着极其重要而深刻的影响,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曾在《瘟疫与人》中指出:“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而且,它也一定会和从前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流行病传染模式的变迁,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人类生态上的基本地标,值得更多地关注。”<sup>①</sup>由于疫病始终与人类相伴随,给人类带来了难以尽述的痛苦和恐惧,因此在一个文明社会中,应对疾病的医疗观念和实践也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和塑造着人类的行为和思想,进而广泛而具体地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正因如此,借助呈现和透视历史上的疾病医疗,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变迁。由此可见,疫病社会史研究乃是一个十分重要并具有广阔前景的研究领域。从笔者自身的研究体会来说,

<sup>①</sup> 麦克尼尔著,杨玉龄译:《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339、262页。

它对了解历史上人们的生存状况、精神面貌、环境与社会的变动、民众的心态等等，都是非常有利的，将可以使我们看到一幅“真实存在”却长期以来未被发掘的重要历史面相。

人类瘟疫历史长期被历史学界所遗忘，应该不是偶然的，个中的缘由，除了史料中有关瘟疫的记载相对较少、瘟疫本身不具有规律性等自身因素以外，恐怕主要还与我们的学术理念乃至思想文化取向有关。那就是，在我们的学术理念中，缺乏一种对生命的真正的关怀。为了生存和发展以及鉴往知来，我们往往热衷于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或者历史规律的探寻，而惟独忽视了历史的主体——人自身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虽然生命的可贵对每个人来说可能都是不言自明的，但在我们整体的社会理念中，个体的生命在很多情况下其实不过是实现某种整体社会目标的一个环节和工具，而较少能真正体认到“人民的健康也是硬道理”，生命的存在乃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伦理。其实，对生命的缺乏关怀又岂止只存在于学术理念之中，在我们的社会意识中又何尝不是如此？稳定和发展对人的生存自然是重要的，但如果这一切不能建立在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珍视的基础上，不仅稳定和发展恐怕也就很难长久地保持，而且更为根本的，若稳定和发展不是为了个体生命的福祉，那意义又在哪里呢？认识到了这一点，其实就不难发现，我们学术上以及现实中的很多积习其实都与我们的缺乏对生命的真正关怀和珍视有关。比如，学术上，过于追求宏大叙述而轻忽历史细节，热衷于规律的探寻而忽视人的生存境况等等；现实中，片面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不加思考地将“革命”、“改革”视为社会最高目标，施政办事不立足民生的改善而追求“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匿灾不报等等。如果从这一角度而言，瘟疫史的研究，通过对历史上与人类生存环境和境况息息相关的瘟疫的钩沉，显然有利于我们真正了解历史上的生命，从而培养我们对关注生命、珍视生命的意

识。而一旦这样的理念得以深入人心,也就增加了破除以往学术上、社会上乃至政治上的种种积习的可能性。这也就是说,在我们当前的境遇下,这一研究的深入开展将有可能同时具备学术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历史学对包括瘟疫在内的疾病医疗的疏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乃是一个世界性普遍问题,不过,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一倾向在西方史学界就已出现改观。至今,探讨历史上的疾病医疗以及借此透视社会和文化的医疗社会史和身体史研究乃是当前史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并业已成为主流史学的一部分。这一潮流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海外乃至国内的中国史研究,1975年美国的邓海伦(Helen Dunstan)发表了国际中国史学界最早的具有自觉意识的疫病社会史论文——《明末时疫初探》<sup>①</sup>。随后,大约分别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开始,台湾和大陆史学界也逐渐兴起了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当然,海峡两岸的这一研究的兴起,并非仅是世界史学潮流影响而致,可能更为重要的还是1980年代以来其内部对以往研究的不满并予积极反省的结果。1980年代以来,大陆和台湾史学界不约而同地开始对史学研究中各自存在的“教条公式主义的困境”或“社会科学方法的贫乏”展开了反思,大家似乎都对以往研究过于侧重政治、经济、阶级斗争及外交和军事等做法表示出了强烈不满,提出了“还历史以血肉”或“由‘骨骼’进而增益‘血肉’”这样带有普遍性的诉求。<sup>②</sup>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社会群体、社会生活、社会人口、社会救济、社会环境等等一些过去不被注意的课题开始纷纷

<sup>①</sup> Helen Dunstan: *The Late Ming Epidemics: A Preliminary Survey*, *Ch'ing Shih Wen-ti*, Vol. 3.3 (1975), pp1-59.

<sup>②</sup> 参阅社正胜《什么是新社会史》(《新史学》1992年第4期),常建华《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援入历史研究者的视野,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界域。在台湾,在梁其姿、杜正胜等人的努力实践和积极倡导下,其研究目前已蔚为风气,成为台湾史学的热点之一。而大陆虽然起步较晚,而且当下的研究,与台湾相比,仍处于散兵游勇状态,既乏人倡导,也未成立专门的研究小组,自然就更谈不上有什么指引和规划,但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甚至涉足这一研究领域,同时,还不断有年轻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开始介入其中,显现出这一研究未来良好的发展势头。<sup>①</sup>由此,不难看出,这是刚刚起步但具有方向性和广阔前景的研究领域。

疾病医疗社会史或身体史研究是一个牵涉范围甚广的领域,而且还存在着社会史、文化史等多种不同的研究取向。<sup>②</sup>但无论如何,疾病,特别是其中的瘟疫史必然是其中最基本的内容之一。跟一般的疾病基本只与病人及其亲属直接相关不同,瘟疫一旦发生,就关乎整个社会。并非只是一种个人的自然生理现象,也是关系到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事实上,相当多的历史研究者在涉足这一领域时,也往往是从疫病人手的。由此可见,从社会史的视角对中国瘟疫史的探讨,在当前的情形下,无论从现实还是学理来说,都是非常必要而且深具意义的。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其先民必然会有较多的与瘟疫斗争的经历并留下相对丰富历史记载。早在商

---

<sup>①</sup> 参阅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世纪明清疾病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从社会到生命——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sup>②</sup> 参阅余新忠:《从社会到生命——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代,我们的祖先就在甲骨文中载录较多的疾病史资料<sup>①</sup>。虽然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像欧洲的黑死病那样对人口和社会产生结构性和根本性影响的显著事件,但在汗牛充栋的历史载籍中,存在着大量值得我们注目和考量的疾疫史资料是无可怀疑的<sup>②</sup>。由于资料丰富程度的不均衡,加上目前总体研究的薄弱,我们还很难确定地表明历史上各个时期疫病的分布情况,不过仅从已有的记载来看,中国历史上的瘟疫频次各个时代虽有起伏,但总体上还是呈现出逐渐增加之态势<sup>③</sup>。特别是明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剧增,这一趋势表现得更为明显。可见,至少在目前的资料条件下,从比较晚近的历史时段——近世<sup>④</sup>切入展开中国瘟疫史的探讨具有较高的现实可能性。不仅如此,选择近世——从明代后期(万历以后)至民国这一历史时期来加以探讨至少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从瘟疫发生情况看,明代后期正是瘟疫频发的时期,在万历和崇祯时期,在华北和南方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瘟疫。而清代以来,特别嘉道以后,既是中国社会转

① 参见胡厚宣:《殷人疾病考》,见《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 1944 年。

② 其实,即便在我们常用的资料中这类记载显得零散和稀少,但有关疾病医疗社会史的一些问题,前人虽可能没有有意识地予以专门的记载,但这类与人的生命密切相关的事务其实是任何时期的人们都不可能不涉及的,故也必然会在日常的记载中零散和迂回地体现出来。因此,只要悉心挖掘,就不难发现。

③ 参阅本书第一章。

④ “近世”一词,目前学术界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早年由日本学者提出,主要由指宋元明清这一历史时期。近年,在探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道路时,中国和西方的研究者也使用这一概念,一般指明代中后期至民国初年这一时段,大体相当于西方学者所谓的“Late Imperial China”。不过在本书中所指涉的为从明代后期(万历以后)至民国这一历史时期。

型和日趋国际化的时期,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境中,不仅重大疫情较多,而且也相对具有典型性。二是明中后期以来,中国社会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逐步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并最终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同时,这一期间也是中医温病学(主要治疗传染病)形成并取得重要发展、近代医疗卫生制度逐步引入并基本建立的历史时期,因此,研究这一时期的重大疫情,不仅有利于了解中国近世瘟疫发生的一般规律,同时可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医与传染病斗争历史与成就、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确立近代医疗卫生制度的过程及其经验教训,进而更深入理解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理路和所谓的近代转型,同时为现实的医疗卫生制度的建设提供借鉴。

具体到中国近世的疫病史研究,虽然历史学界的相关探讨的兴起是非常晚近的事,但医学史界从技术史角度的探讨已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并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成就<sup>①</sup>。不过,包括瘟疫在内的疾病史在中国医学史研究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sup>②</sup>,而且,他们的研究关注点较多地局限在技术与病理层

<sup>①</sup> 这方面的综述可参阅:郑金生、李建民《现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源流》(《大陆杂志》,第95卷,第6期)第26-35页,李经纬、张志斌《中国古代医学史研究60年》(《中华医史杂志》1996年第3期)第129-136页,傅芳《中国古代医学史研究60年》(《中华医史杂志》1996年第3期)第162-169页,斯士英《疾病史研究60年》(《中华医史杂志》1996年第3期)第152-161页,赖文、李永宸等《近50年的中国古代疫情研究》(《中华医史杂志》2002年第2期)第108-113页和余新忠《20世纪明清疾病史研究述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另外香港地区的情况可参阅吴国栋《近四十年来香港医学发展史的研究概况》(《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三十一期)第73-91页。

<sup>②</sup> 参阅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面,故虽然对我们认识中国传统病名的内涵、症候和演变,疾病的治疗手段和疗效等方面多有助益,但对疫病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比如:疫病流行状况、流行的相关因素分析,特别是国家和社会对疫病的反应、疫病对社会及民众心态和信仰的影响等内容则基本未予注目。<sup>①</sup> 历史学界近年的研究,虽然出现一些就某次和某种瘟疫展开较为深入讨论的论文,但系统性的论述还非常缺乏,从社会史角度综论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疫病的著作更是尚未出现<sup>②</sup>。除了单篇论文,就管见所及,目前已出版的相关著作共有四部,它们分别是:美国 Carol Benedict 的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sup>③</sup> (《中国 19 世纪的腺鼠疫》)、张剑光的《三千年疫情》<sup>④</sup>、日本饭岛涉的《ペストと近代中国:衛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変容》<sup>⑤</sup> (《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与社会变迁》)和拙著《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sup>⑥</sup>。Carol Benedict 和饭岛涉的著作都属于立足鼠疫探讨近代社会变迁和卫生制度化进程的专题性成果,Carol Benedict 强调从历史、

① 参阅余新忠:《20 世纪明清疾病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 年第 10 期。

② 有关的研究状况可参阅郑金生、李建民《现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源流》(《大陆杂志》,第 95 卷,第 6 期)第 26-35 页,李经纬、张志斌《中国古代医学史研究 60 年》(《中华医史杂志》1996 年第 3 期)第 129-136 页,傅芳《中国古代医学史研究 60 年》(《中华医史杂志》1996 年第 3 期)第 162-169 页,靳士英《疾病史研究 60 年》(《中华医史杂志》1996 年第 3 期)第 152-161 页,赖文、李永宸等《近 50 年的中国古代疫情研究》(《中华医史杂志》2002 年第 2 期)第 108-113 页和余新忠《20 世纪明清疾病史研究述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 年第 10 期)。

③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④ 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8 年版。

⑤ 研文出版社 2000 年版。

⑥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